

## 對文化與經濟的思索： 經濟人類學與文化經濟學的跨學科對話

張育銓 \*

### 摘要

Immanuel Wallerstein(1991: 218-226; 1995:839-840)在反思社會科學的發展史與相對的限制時，認為社會科學的創新不是透過跨學科，而是透過分裂與混交的雙重過程。在人類學的學科發展史上，因不斷產生知識與知識專門化，出現許多新的領域與次學科，這樣的發展過程中，分裂與混交的歷程是如何進行，在學科內與跨學科之間有什麼樣的採借與修正的辯證過程，本文在這樣的問題意識下，以人類學中的經濟人類學發展為脈絡，並以經濟學中的文化經濟學做為跨學科的對照與對話的起點，以釐清這樣的辯證過程。

本文發現，在1980年代之後，經濟人類學與文化經濟學互相向對方的學科界線及研究成果靠攏。這樣的轉型具有多層的意涵，其中以擴大對文化與經濟的理解以及對學科預設的突破最為明顯。儘管目前透過實驗經濟學產生人類學與經濟學的合作機會，但在議題上卻無法展開彼此的理論對話。本文提出遺產經濟做為兩個學科共同研究的議題，以深化分裂與混交的可能性。

關鍵字：經濟人類學、文化經濟學、跨學科、遺產經濟

---

\*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副教授



# Considering Culture and Economy: The Interdisciplinarity Dialogues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and Cultural Economics

Yu-Chuan Chang \*

## Abstract

Immanuel Wallerstein(1991: 218-226; 1995:839-840)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and limit of social science, he consider the innovate of social science is not through trans-disciplinarity, but through fragmentation and hybrid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anthropology, the root cause of knowledge and knowledgeable specialization result in lots of new research field and sub-disciplines. In the plentiful development, how do fragmentation and hybridization work out? What is the dialectical process of borrowing and modification between intra-discipline and trans-disciplinarity? The paper attempts to describe the dialectical process between Economic Anthropology from Anthropology and Cultural Economics from Economics.

The paper present the special tendency, after 1980, Economic Anthropology and Cultural Economics pay close attention to what the discipline compass and research result from each other. This transition have multi-meaning, special in expanding the understanding of culture and economy, emerging more closer problem consciousness to each other, exploding the presupposition of discipline. Although Experimental Economics make a good cooperative opportunity for anthropology and economics, but it couldn't expand dialogue's depth in mutual item. The paper offer Heritage Economy to be the mutual item for the possibility of fragmentation and hybridization.

**Keywords: Economic Anthropology, Cultural Economics, Interdisciplinarity, Heritage Economy**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nd Cultural Affairs, 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 壹、前言

任何經濟活動都鑲嵌於特定的社會文化脈絡，經濟活動更是文化的具體表現(Granovetter, 1985, p.69-93; Hollingsworth and Boyer, 1997, p.1-47; North, 1981, p. 47-59; Polanyi, 1958)；亦即，經濟運作出一套可辨認的價值、價格與交換系統，而文化活動也無法脫離特定時空中生產、分配、交換與消費的總體關係。這樣的系統與關係在文化經濟化與經濟文化化(Scott, 1997, p.39-58)的趨勢下，文化的經濟功能和經濟的文化動能呈現更頻繁、更密集、更動態的文化與經濟互動。

人類學發展出經濟人類學處理文化與經濟的關係，領域介於經濟史和經濟學之間，探討經濟活動的文化構成。相對的，經濟學中的文化經濟學也處理文化與經濟的問題，不同的是，經濟人類學透過經濟學角度探究文化中的經濟行為，文化經濟學則直接把文化視為經濟項目中的主體與商品，兩者在認識論與本體論皆具差異。以往，這兩個學科的對話集中於基本概念與基本預設的引用，很少深入到理論探討與修正。但是，1980年代後，經濟人類學與文化經濟學各自對母學科理論預設的修正歷程中，呈現兩個學科越來越接近的理論取向，筆者認為，應該可以找出更為相互採借與批判的地帶，產生更多跨學科整合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必須回到學科的發展脈絡，透過不同理論的辯證歷程才能讓整合的契機獲得釐清。

## 貳、經濟人類學與「經濟人類學」

經濟人類學是人類學領域中，相當重要且發展甚早的次領域，許多研究成果與概念已經成為民族誌中的不可或缺的項目。底下以1980年代的學術辯論為劃分，討論不同時期對經濟學的引用，與不同年代的研究議題轉變，以及對母學科的貢獻和衝擊。

### 一、1980年代以前的經濟人類學

經濟人類學對「何謂經濟」的討論，直到二次大戰期間，針對西方經濟體制提出質疑後，才有比較完整的論述；包括Bronislaw Malinowski(1922)透過在初



布蘭群島的研究，提出原始社會多樣的交換經濟形式，駁斥進化論過度簡化為僅有以物易物的看法。Marcel Mauss(1954)透過禮物經濟的普遍性，論證理性計算的經濟理性是近代的觀念。Karl Polanyi(1958)則將人類的經濟區分為形式論(Formalism)與實質論(Substantivism)的差異，並主張所有的經濟行為不能脫離社會的制度而存在。這些研究引起實質論與形式論的論戰，兩派最大的爭議在於：以西方工業革命為背景的經濟理論能不能適用於解釋原始社會的經濟？

1970年代實質論與形式論的論戰，根源於兩派對經濟的普遍意義的假定不同(黃應貴, 1974; Cook, 1966; Godelier, 1977)。實質論從制度經濟學(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角度，認為經濟是讓社會滿足物質需要的方法，制度為達成目標的努力，強調交換模式(Dalton, 1969)。因此，經濟不是一個單獨的領域，而是鑲嵌於地方文化系統(Wilk, 1996)與社會組織類型(Granovetter, 1985)。而形式論依循新古典主義經濟學(New Classical Economics)的觀點，基於理性行動與決策的邏輯，透過對稀有資源的配置達到效用最大化的模式來解釋行為(Schneider, 1974)。兩學派除了引用經濟學理論來支持各自對經濟的看法外，也加入當時新興思潮來延伸雙方的論戰，擴大各自的理論適用性，也擴大論戰延伸的範圍。特別的是，當人類學的實質論與形式論從新制度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不斷獲得理論支援時，在經濟學內部卻發展出文化經濟學來批判這兩大學派的基本預設，導致1970年代兩個學科還未能發展出實質的對話。

許多學者試圖跨越實質論與形式論的界線，尋求整合的可能。如Mary Douglas(1962)論證工作組織和消費水準的經濟模式之間的相似，與親戚和政治的社會類型有關。Jack Goody(1967)顯示非洲和歐亞大陸在分工的類型，以及商品的交換之間與其他社會、經濟和技術差異緊密相關。Chris Gregory(1982)呈現新幾內亞高地社會的經濟與交換、結婚、政治權力的類型相互關連。Douglas則與經濟學家共同研究，證實不同類型的社會結構會引導出不同類型的消費者偏好(Douglas and Isherwood, 1979)，並且對風險有不同的知覺(Douglas and Wildavsky, 1982)，說明個人與文化之間互為主體的經濟模式不僅存在，更具有多種可能性。Marshall Sahlins(1976, 1981, p.31, 41)認為，西方社會對肉和布不同類型的偏好，反映出其文化類型的影響；而原始的夏威夷社會接觸歐洲和北美的反應，也呈現出其文化類型的影響，夏威夷人不僅期待從事交易，也呈現出不同地位和性別的人，對不同進口商品的個人偏好。然而，這些整合研究卻遭受新馬克思主義



的批判。

新馬克思主義認為，實質論將經濟視為維繫社會所有事物的面向，卻沒有任何維繫社會的事物被確定為經濟(Cook, 1973, p.809)。再者，實質論對原始和現代經濟的嚴格區別有問題(L. Pratts, 1982)；交易模式的限制條件是情境的而不是系統的；一些普遍性的價值觀跨越不同社會具有可能性(Plattner, 1989)。新馬克思主義也認為實質論對事實的社會建構太理想化，並且對個體在影響生計的選擇時，所面對的外部限制的分析太過薄弱(Gudeman, 1978)。目前大多數文化被整併到全球資本主義系統中，儘管人們會保留他們現存的世界觀，普遍模式仍可被用於解釋世界其它地方的動力。新馬克思主義也批評形式論提出效用最大化的預設是套套邏輯(S. Pratts, 1989, p.212)，Stephen Gudeman(1978)認為經濟人類學家不斷地「找到」人們表現出「理性」的案例，是因為形式論者的模式引導所致。

1980年代許多研究試圖為1970年代的爭議尋求新的出路：Clifford Geertz(1984)透過爪哇鄉村經濟變遷的個案，比較並評估形式論、實質論、新馬克思主義，先以它們個別提出的解釋與假設，再用經驗數據測試它們。這種比較評估模式被應用在其他研究上，例如新幾內亞高地的交易類型(Gregory, 1982)，而Christina Gladwin(1979)及Peggy Barlett(1980)則評論不同理論類型之間詮釋能力的差異。這些研究除了把不同理論取向進行比較外，也給文化與經濟的關係重新定位，等於宣告實質論與形式論的論戰在1980年代末期劃下句點。

## 二、經濟人類學對文化實踐的思索

基於西方古典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模式而展開的經濟人類學研究，採用西方理性主義模式詮釋不同文化中的交換體系，認為交易、貨幣與市場組成經濟制度，構成人們社會生活的基本特徵。針對這樣的研究模式，一九六〇年代許多學者認為經濟學具有深刻的西方文化侷限性，是西方文化的表達，不能詮釋其他文化的事實。於是，經濟人類學的研究便開始側重於對原始的狩獵採集民族的世界觀與西方文化的世界觀的民族誌比較分析，並且強調生產在實質與象徵的交換所形構出的關係，以及伴隨的權力關係。這是經濟人類學擺脫西方經濟學的文化預設，並且專注文化價值體系研究的起點，卻也同時導致經濟人類學只分析經濟現象而不重經濟理論，使得跨學科合作出現僵局的起點。



經濟人類學對全球化的文化變遷研究，集中在第三世界對外來經濟因素的衝擊與適應，尤其金錢概念的轉變與適應(Akin, 1999; Bloch, 1989; Brison, 1999)，並針對外來文化媒介對價值觀與交換系統的衝擊(Acheson, 1985; Bohannan, 1955; Kingsolver, 1992)、文化商品化對文化的衝擊(Appadurai, 1986; Kopytoff, 1986)、當地適應策略(Straight, 2002; Taussig, 1980)等問題進行探索。其中，透過金錢所延展的議題，只是反應經濟學中的交易面向，除了分析面向過於狹隘外，仍舊試圖將經濟含納在文化範圍中，做為變遷的依變項。這僅僅是將經濟從生業方式的生產面，轉移或擴充到交易面，形成交易媒介而已，相對於其他社會科學，則較少當代消費的研究。

1980年代起，經濟人類學認為，經濟現象是歷史脈絡中，由經濟結構的動力與原有社會文化的特色共同締造，將分析角度定位在客觀的結構如何為人們主觀的理解，也就是主觀能動性與經濟結構之間的互動關係。例如Jane Schneider & Peter Schneider(1976)發現西西里島的黑手黨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與當地傳統價值觀相互交融的結果。Michael Taussig(1980)以哥倫比亞的勞工及玻里維亞的錫礦工人，探討他們如何以傳統信仰，理解並轉化資本主義帶來的異化。Sidney Mintz(1985)透過蔗糖生產和消費發展，說明蔗糖轉變的歷史過程。Sahlins(1981, 1994)指出夏威夷人將庫克船長視為神，從而轉變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1980年代末期，Christina Toren(1989)以斐濟的飲錢(drinking money)指出，市場經濟傳入後，貨幣並未摧毀反而延續當地的政治秩序。Janet Carsten(1989)以蘭卡威的煮錢(cooking Money)說明，婦女把丈夫從聚落外賺得的錢幣購買食物，透過煮食與各家戶分享的過程，將家戶內的運作邏輯外延到聚落。Watson Watson(1997)說明麥當勞的運作方式，如何被不同區域文化重新詮釋與操作的歷程。這類研究賦予文化更積極的角色，強調當地人觀念、文化結構與意義體系。Andrew Sayer(1997)認為這類研究將經濟與文化相對自主地對待，發展出當地人觀點下的「文化經濟學」(Cultural Economy)。筆者認為，Sayer的「文化經濟學」並非經濟學的文化經濟學(Cultural Economics)，這個詞彙是為了與經濟人類學做出區別，在性質上比較接近John Clammer(1978)所指稱的新經濟人類學(New Economic Anthropology)。

Clammer(ibid., p.17-18)以法國結構馬克思主義的角度，透過生產模式與依賴理論從事發展研究，認為新經濟人類學可以彌補傳統經濟人類學與經濟發展問題



之間的落差。強調面對發展研究時，必須回答更根本的問題，如「何謂發展」。也強調新經濟人類學必須跨越人類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的學科界線。之後，Clammer(1987)更強調重新思索莫斯的認識論問題，並將理論視野轉換到更廣的政治經濟學與象徵論，與對日常生活實踐描述的民族誌。儘管Clammer(1978, 1987)試圖橫跨鉅觀與微觀以及跨學科，並提出知識論的問題，但是，僅集中在法國新馬克斯經濟人類學的脈絡，導致對新議題的回應能力受到侷限。

新經濟人類學並非一個學術上被普遍認定的詞彙，但是它所代表的時代意涵，卻是明確的。如黃應貴討論經濟人類學的轉變時提到：「1980年代以來所謂『經濟人類學』研究雖各有不同的著重點，但都注意到經濟現象的外在歷史客觀條件，以及被研究者主觀的文化視野，如何相互界定、發展出人的活動」(1993, p.134)。黃應貴在全文中僅有這一次特意在「經濟人類學」這個詞彙加上引號，依該文的脈絡推敲，可以視為經濟人類學新研究取向的起點。

黃應貴以「經濟人類學」的詞彙，期待會有新的理論契機出現。但在十五年後，他發現經濟人類學所建構的並不是經濟理論，而是社會理論(2008, p.261)。於是在新近的論述中，他對1980年代後的經濟人類學新發展，改以文化經濟學(Cultural Economy)一詞來取代「經濟人類學」，用以描述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的經濟人類學分支，並將Mauss視為文化經濟學研究的濫觴，而*The Gift*是第一本「文化經濟學」<sup>1</sup>的民族誌。Taussig的*The Devil and Commodity Fetishism in South America*一書則是文化經濟學的開端(同上引: 263-264, 268)。也就是說，黃應貴透過次學科發展史的角度，將當年所指的「經濟人類學」研究思潮，上溯到一九五〇年，同時也把研究範圍限定在更為狹義的範疇，尤其將消費與物質文化研究視為經濟人類學的新潮流(同上引: 267, 275)，不屬於一九九三年所提出「經濟人類學」的範圍，也摒除在二〇〇八年所提的文化經濟學之外。因為黃應貴認為，文化經濟學透過「文化」探討「經濟」，最後能夠處理的反而是文化，而非經濟。這是由於文化理論中，具有文化特殊性與人類理性之普同性的內在矛盾，這種內在矛盾往往造成文化與經濟的對立，以至於文化經濟學的探討往往忽略經濟行為本身，最後導致它的沒落(同上引: 281)。

無論黃應貴是在「經濟人類學」的範疇下，認為新的研究取向可提問知識論

---

<sup>1</sup> 引號為原作者所加。



與本質論的問題(1993, p.164)；或者是在文化經濟學的架構下，認為新自由主義經濟的性質與新的文化形式是未來可能發展的新方向(2008, p.280-281)。黃應貴在兩個時期對經濟人類學的範疇與未來發展的不同解讀，正好符合經濟學中新文化經濟學的主要問題意識，而這正是本文以經濟人類學的發展脈絡思索與經濟學跨學科整合的起點。

## 參、文化經濟學與新文化經濟學

相對於人類學的研究取向，經濟學則發展出文化經濟學的次學科領域，引入文化因素作為經濟思想的約制或對照，底下以對經濟學的批判與對經濟本質的思索，區分文化經濟學與新文化經濟學的領域進行探討。

### 一、文化經濟學對經濟學的批判

經濟學分析重要的基本預設包括：人的任何行為都是經過選擇的，並且以理性決策與資源有限與缺乏為前題，也假定最大化行為、市場均衡和偏好穩定等核心因素(Henrich et al, 2001; Kagel and Roth, 1995; Samuelson, 1947)。這些預設中最受批評的是，缺乏對文化因素的考量。

Fukuyama Fukuyama(2001, p.16)指出：西方主流經濟學即使擴展到新制度經濟學時代(實質論的經濟學理論來源)，也無法對文化價值觀層面的深刻轉變做出分析。Throsby Throsby(2003, p.11, 18-19)也認為經濟學是一門沒有文化脈絡的學科，它是在一個既不被任何文化現象所決定，亦不以任何文化現象為條件的世界中運作。然而，經濟的驅動力是個人主義的，而文化的驅動力是一種對群體經驗或集體生產消費的渴望，對組成群體的個人而言，這些因素不可能完全被排除。同樣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形式論的經濟學理論來源)重視勞動力、資本和原物料的投入對生產的影響，而對知識和技術等文化要素和文化力量的投入，認為是外在的，並非主要的因素(Owen-Vandersluis, 2003)。例如諾貝爾獎得主Paul Samuelson(1947)把民族傳統和文化潮流視為一種制約世界經濟的元素，認為經濟衰退很大程度上在於各國的傳統、價值觀和政治狀況。儘管薩繆爾遜提出經濟與文化不可分割的看法，但是薩繆爾遜把文化視為經濟成長的純制約元素，窄化文化的





影響。

經濟學面對研究消費行為時，經濟學家開始修正將消費者視為給定的、無法形容的、不能分析的等預設。如關於消費者習慣養成和上癮的研究，著重消費者喜好受消費過程的影響(Becker and Mulligan, 1997; Messinis, 1999)。Sarah Owen-Vandersluis(2003)則檢視福利經濟背後的道德基礎，以及文化政策中常採用的社群方法作為規範的基礎，說明對待文化所採用的不同方式，是面對各種價值在競爭之下所做出的選擇。筆者認為，這類研究若從學科史與知識論的角度，可以解讀成經濟學藉由對消費者與公共財性質的福利經濟的重新界定，試圖透過個人與文化的關係以及群體與經濟的關係，巧妙地跨越到文化與經濟的關係上做為新的論述起點。

經濟學家逐漸意識到文化不是給定的，且文化不適用於既有的經濟學價值理論模型，為解決日益受重視的文化議題，發展出文化經濟學以釐清經濟行為中的文化因素，並從母學科的預設中發掘產生限制的因素，研究文化差異對經濟思想與行為的影響。例如Owen-Vandersluis(2003)認為文化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並不是文化本身，而是生產文化、供應文化和使用文化的活動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經濟現象，從文化理論與經濟理論的相互結合上來考察文化商品的運動、變化和發展的客觀規律。換句話說，文化經濟學主張文化生產的過程是主動的社會建構、再現和詮釋的過程。儘管文化經濟學對文化的看法已不是簡單引用文化功能或類別分析，已邁向多元文化的主觀價值詮釋與建構。可惜的是，文化經濟學在這方面的努力並未受到經濟人類學的注意。

## 二、新文化經濟學對經濟本質的思索

文化經濟學在累積大量研究後，因研究對象、理論模式、分析方法上的差異，逐漸區別出舊文化經濟學與新文化經濟學(New Cultural Economics)(Klamer, 1996, 2003)。舊文化經濟學主要應用產業經濟學的研究典範和方法論，以文化產業和文化政策為研究對象，認為以利潤為主導的經濟範疇中，文化成為可買賣的財貨或商品(Keat, 1999, p.92-111)，納入企業管理、市場行銷與政策規劃(Lewis and Miller, 2003)。舊文化經濟學是經濟人類學比較熟悉的領域，因為符合經濟人類學對生產、交易、分配的思考架構，尤其是透過金錢的概念將文化商品化、交



易雙方的互動關係、文化經濟產生的經濟效益與對文化的衝擊等面向。相對地，經濟人類學較為忽略新文化經濟學對文化價值觀的討論。

新文化經濟學將文化具體化為價值觀體系進行經濟學分析，認為價值觀體系提供人們如何取得回報和避免代價的解釋，不僅指導人們的行動，而且能夠節約人們決策的成本，這正是文化的功能和價值所在。例如Fukuyama(1995)分析公共道德與經濟增長的關係時，認為當利潤最大化被視成普遍的經濟行為規範後，文化商品的生產就會依據這種規範來進行，但重點不在於生產什麼樣的文化商品，而是建構出一套文化生產的意識形態。同樣的，Douglass North(2000, p.119-120)指出要超越個人主義的狹隘數值計算，建立更接近現實的預設，強調意識型態對人類經濟行為的重要影響。Zukin Sharon(1995)從象徵經濟(Symbolic Economy)的角度解讀文化產業對先進國家的都市再生，以及第三世界國家對抗資本主義工業剝削的生存性策略，除了復甦地區經濟，也活化文化生活價值。Dominic Power(2002)也認為透過文化經濟產生的文化相對自主性可以使得原有文化與經濟的緊張關係趨於緩和，文化變成經濟的資源，而經濟也成為文化的一種形式，改變文化與經濟之間的關係，也逐漸增強文化的影響力。John Howkins(2001, p.xiii)與Richard Caves(2000)則從英國的實例中說明：文化產業對知識以及創意的需求，除了帶動對文化的重新思索與定位，並進一步重塑文化的價值觀。因此，新文化經濟學認為，觀念是生產與消費行為最根本的規範，這種行為規範如果沒有相應的道德或價值觀念做基礎，商品生產就不可能存在。

當新文化經濟學引入文化概念以修正經濟學理論預設時，許多經濟學家透過文化概念，質問何謂經濟，試圖彌補經濟學以理論模式解讀現實社會時，因過度條件限制產生與事實無法完全吻合的困境。因此，當新文化經濟學提問文化為何時，其實是在提問有關經濟學本質論的問題，這一點正好與黃應貴(1993, p.164)對「經濟人類學」或文化經濟學的期待相符合。

此外，新文化經濟學堅持理性行為預設，認為文化是個人選擇的結果，並以文化成本做為理解人類行為和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從文化成本概念出發，可以對抽象的文化概念進行實證的命題來解釋大量與文化理念有關的社會現象，也可深入分析文化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的內在聯繫。例如Ronald Inglehart(2004)進行世界價值觀調查，發現文化觀念、宗教傳統、社會信任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存在著密切的相關性。Lawrence Harrison(1985)應用大量的案例顯示，多數拉丁



美洲國家的文化成為發展的一大障礙。David Landes(1998)對五、六百年來富國和窮國的歷史分析後，認為文化會使局面完全不一樣。這樣的結論正好與黃應貴(2008, p.281)對文化特殊性與人類理性之普同性的內在矛盾的說法相同。不同的是，新文化經濟學並未因此忽略經濟行為本身，使得新文化經濟學得以引進時間維度，強調文化變遷與制度變遷、技術變遷的關係研究。在引入經濟史和文化史的資料時，文化變遷理論還有助於理解歷史上存在的大量經濟增長與停滯、收斂與擴散的現象，擴展人們對於經濟效率的理解，使新文化經濟學在解釋長期的歷史事件中具有優勢。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以經濟史與文化史的文化變遷研究策略正也是經濟人類學的特點。

## 肆、學科的轉變與學科整合的契機

1980年代，人類學中的經濟人類學與經濟學中的文化經濟學皆出現研究取向的轉型，各自發展出「經濟人類學」與新文化經濟學，各累積更多田野資料與經驗研究外，也試圖突破母學科與次學科的限制，互相向對方的學科界線及1980年代後的研究成果靠攏。這樣的轉型具有多層的意涵，其中以擴大對文化與經濟的理解以及對學科預設的突破，這兩方面最為明顯。

### 一、擴大對文化與經濟的理解

近年來在研究議題上，經濟人類學與文化經濟學也有逐漸相互靠攏的現象出現，生產、分配、消費、金錢、商品經濟、經濟理性與倫理等變成共同的研究議題。在當代的經濟脈絡下，融入文化經濟的概念，不只集中在文化商品化、消費、跨國流動，更從微視跨到鉅視，找回經濟與文化之間更多元的關係。

經濟人類學將經濟從文化的範疇中獨立出來，經濟不再是文化變遷的依變項，並賦予文化以更積極、創造的角色，強調當地人觀念以及客觀的結構如何為人們主觀的理解，探究文化結構與意義體系。隨著資本主義在強度及本質上的轉變，文化等非經濟因素反成為探索經濟的一扇窗，經濟人類學加入當代消費的論述後，更在歷史脈絡與權力關係中探究經濟現象的本質問題。

Pierre Bourdieu(1984)認為在任何社會場域中，行動者都會去追求特定的利



益，累積其所擁有的資本，遵循利潤極大化的經濟邏輯而從事一般所謂的經濟行為。文化場域也不例外，文化活動同樣牽涉到文化資本的積累、文化生產的競爭、與文化消費的取用。在Bourdieu(1990)看來，整個生活世界就是一個大型的經濟學世界。我們的日常生活言行都應該被視為經濟的實踐，這樣的取向給予文化與經濟更多可能性。經濟人類學的發展仰賴其提供的文化觀念能否增進對於研究對象之文化性質的理解。在解釋上的效力也須視其分析能否解釋當代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而定。經濟人類學將文化與資本主義經濟結合的分析路徑，正好與文化經濟學相符合。

然而，文化經濟學家在採用文化概念，面臨無法科學化的問題時，採借認知理論，並試圖透過具體的觀察，釐清不得不用卻很難定義的文化概念。考量文化因素時，所分析的材料比標準價值分析還多，使經濟系統的研究已經非常接近經濟人類學。為更理解經濟體系的運作和執行，新文化經濟學家將注意力轉向價值、規範、文化或認知的概念與議題(Herrmann-Pillath, 2000, p.31-39)。但是，人類學仍認為只能透過文化觀察的方法來觀察文化，反對文化可被任何具體物件直接觀察的假定。再者，文化經濟學對文化的概念傾向於單一的、物質的、具體化的、人們所擁有的部分，使得新文化經濟學出現過度簡化文化的影響性以及忽略文化的內部差異等問題。依前面的討論可以理解，這樣的文化概念源於經濟理性的預設。從學科史角度，新文化經濟學者已能接受在經濟現象背後「文化」的運作。尤其，新文化經濟學認為文化價值是內存於事物或其他文化現象中，其存在乃獨立於消費者對此事物的回應之外。再者，文化價值的某些特徵無法以偏好方式來表示。此外，衡量某些文化價值特徵的尺度，也許無法轉換為貨幣單位，卻可以用文化價值評價的協商過程來衡量，包括人與人之間的交換和互動(Throsby, 2003, p.40-42)。這類研究明顯試圖回歸實際脈絡的行為者及其文化進行考量，這對經濟學的原有預設，無疑跨出相當重要的一步。同時，新文化經濟學對地方性的價值體系已開始具有民族誌的基礎與特徵，加上「經濟人類學」與新文化經濟學各自擴大對文化與經濟的理解，及其適用範圍，使得相互之間的重疊處逐漸增加，為學科整合增加更多可能性。

## 二、對學科預設的突破

學科的基本預設是一個學科與其他學科做出區別的重要指標，同時也是學術



分類與索引的基本項目，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學科的基本預設經常也是理論與議題發展上的限制所在。因此，對學科預設的突破更可以視為跨學科之間分裂與混交(fragmentation and hybridization)的具體實踐。

在經濟人類學方面，人類學以小窺大的方法論，試圖透過相對較小與少數的群體或區域，作為認識整體或更大區域的基礎。尤其從一九五〇年代的芝加哥學派對印地安村落的經濟研究(Marriott, 1955, p.171)到Robert Redfield(1956)對小傳統與大傳統的理解方式，成為經濟人類學在微觀與鉅觀之間的辯證來源。然而，Nurit Bird-David(1992)認為針對地方性模式的分析並進行民族誌的論述，這樣的經濟模式不能用於全球範疇內不同經濟體的比較，只能算是一種分析工具與方法。1980年代受文化論與詮釋取向(Geertz, 1979, 1984)的影響，經濟人類學將研究的範圍轉向過程與實踐，因為經濟行為必須歷經過程與實踐才能獲得意義與價值，並且保持地方性觀念的特性及其相互間的緊張對立，以提供比較性的視野，從中摸索適當的分析立場，且不輕易地歸納出普遍性的原則。

在文化經濟學方面，在傳統經濟學中，認為追求利潤最大化以及消費者偏好都在價值判斷之外，並視為給定的。個人的價值觀、理想、個性全部被抽象化，忽略人類行為的多元性與複雜性。儘管經濟學者觀察到與理性以及自利最大化的矛盾現象，但是確切提出解決的並不多見(Sen, 1977; Margolis, 1982)。當新文化經濟學將文化價值觀元素加入人的行為變數時，導致理性行為呈現出複雜表現，擴大對人類行為的解釋。更重要的是，文化價值觀元素的引入，迫使經濟學家去思考和面對偏好穩定的預設是否合理。這樣的脈絡使得賽門(Simon, 1982)試圖透過有限理性的概念，以社會人取代經濟人(Homo Economicus)的預設，以認知偏差的概念對行為主體的理性假設進行修正。

由於對理性假設進行修正，引發許多來自經濟學內部的質疑。如North(2000)認為，新文化經濟學仍屬於以交易成本模式為核心的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文化經濟學分析本身並沒有獲得真正的獨立和展開。面對這樣的挑戰，由於對文化價值觀的觀察和比較有其難度，於是新文化經濟學借助實驗經濟學(Experimental Economics)的方法進行大量的實際調查，從現實中去發現基本經濟原理及其預設前提的侷限條件及其影響。新文化經濟學和實驗經濟學共同借用人類學的方法論，不再設計更嚴密控制的實驗，而是允許不同人類行為存在，並觀察人們不確定的價值觀與他們生活的實際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以便觀察人們如何做出回應以及如



何在經驗的啟發下修正自己的行為。如John List(2003)透過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所收集的資料做為依據，修正經濟學對個人行為的理性預設。

許多研究更發現經濟人的預設有必要修正。John Kagel & Alvin Roth(1995)將人類的決策與判斷的心理學研究引到經濟學，人類在真實市場中使用真實的金錢並非依照利益最大化原則進行交易。Ernst Fehr & Simon Gächter(2000)發現互惠性的廣泛存在，主張人類不但關心自身的利益，也關心他人的利益，呈現人性的複雜性以及人類多元的價值觀。Colin Camerer(2002)以人的非理性行為論證決策的不確定性。這些研究對自利最大化的預設形成經驗的挑戰(Fehr and Schmidt, 1999)，Gary Becker(1996)把利他行為寫進個人效用函數，主張效用最大化代替財富最大化。這些研究成果將經濟人重新定義為可犯錯誤的、有學習能力的行為者，這種操作化的定義更具有理論意義和現實的合理性。

經濟學家也開始與人類學家共同合作，試圖突破理論預設的困境。如Joseph Henrich et al.(2001, 2005)集合十二位人類學家與經濟學家，在十五個具經濟與文化差異性的小型社會中進行跨文化研究，討論經濟學中自我利益最大化模式的預設。研究發現，以自利模式為基礎的預設並無法解釋所有的社會，且個體層次經濟以及人口學的變異無法解釋團體內或跨團體的行為。這一系列的研究，已經為兩學科的整合以及修正理論的試驗，做出良好的開端。

即使1980年代之後，人類學與經濟學在整體上並沒有明顯的交集，但是，在經濟人類學與文化經濟學的次學科上，卻有研究取向的接近。這樣的接近來自雙方對學科預設的反思與修正，經濟人類學將經濟融入當地人觀念、文化結構與意義體系中；文化經濟學則開始探索主觀認知詮釋與個人心理的層面。在問題意識與議題的趨同下，更邁向方法論與知識論的整合，發展出更適合當代具歷史與整體的分析。

當然兩學科之間還是存在差異性：首先，經濟人類學帶有從異域比較的觀點，可以看到對文化的反思。但是，經濟人類學文化商品化的理論只看到文化物，文化象徵被具體化成商品，注意到對物的消費，卻未考慮到行銷面、參與人數、經濟規模、影響範圍以及對整體經濟影響，也就是經濟產業的面向。再者，文化經濟學試圖將文化納入經濟學的討論範圍，但是他們所納入的文化概念與人類學之間的文化概念仍存在不小差異。

透過上述的討論，可以看出以經濟人類學進行議題的擴大和經濟面向的整



合，以及文化經濟學加入文化議題的論述，並且納入變遷的探討，這些趨勢與取向正是本文所指的跨學科整合的可能性。總之，經濟人類學與文化經濟學勢必在全球化的文化動態中，深化對經濟學理論的應用以及對文化意義詮釋的理解，才能因應新經濟型態對當代學術的挑戰。

## 伍、跨學科對話的議題

經濟人類學與文化經濟學在問題意識上有趨近的現象，雖然透過實驗經濟學產生人類學與經濟學的合作機會，但在議題上卻無法展開其對話的深度，找到兩個學科共同研究的議題，成為下一階段的思考方向。筆者認為，遺產經濟(heritage economy)是個不錯的議題。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動世界遺產的概念，透過一套被普遍認可的跨國架構，產生新的論述脈絡，使遺產成為跨學科的熱門議題。遺產的概念承載兩種不同的意義；首先，遺產結合自然、文化與地景，是地區與跨區域的關注焦點，保留人們所需的歸屬感與認同感，並傳承到下一世代。其次，遺產是一種經過試鍊後的遺產產業(heritage industry)，它變成一種為商業目的，對過去進行開發與操控(Loulanski, 2006, p.207-233)。由於，遺產是巨大的象徵財產，出現許多對遺產認同與歸屬型態的探討(Graburn, 2001)，為因應不同文化特性的遺產認知，賦予遺產不同的理解面向以及不同的價值變化(Copeland, 2006)。這樣的遺產論述，使得遺產定義不斷隨著遺產化而修正，呈現出遺產意義的可變動性(Masser, Svidén and Wegener, 1994, p.31)，更使得遺產做為特殊的資源性，可以依據不同社會和群體的需要進行發掘、開發、利用、交換和交易。

遺產是文化對象，也是經濟載體，是文化象徵，更是可交易的商品，適合人類學與經濟學的觸角。雖然遺產經濟尚未形成一個確立的學術詞彙，不同學者卻已透過不同的角度進行探討，尤其針對遺產的政治經濟分析、公共財分析，以及遺產觀光。

在政治經濟方面，Alan Peacock(1998)分析政府介入遺產的客觀性，包括如何決定投入大量資源，以及區分哪些歸於公部門，哪些交給私人管理。試圖將遺產經濟的概念在公部門的管理之外，加入更多當地人的文化概念與意義體系。Ilde Rizzo & Ruth Towse(2002)認為除了政府的介入之外，議題更需延伸到供給誘導需



求(supplier-induced demand)、混合資金、多樣產出、選擇權價值、進入門檻(access pricing)等,才能使得遺產經濟的政治經濟面向更為完整,也才有可能讓當地的意義結構被更完整地理解。Ezre Mishan(1969)提出具人類學的分析,強調觀光中主客之間的交易可以用「位置財」(positional goods)來理解,以位置的概念呈現與財貨的關係;個體在消費位置財時的滿意度並非可擴張(expandable),而是仰賴與他人的相對位置來決定。Robert Healy(1994)將這樣的概念擴展到共享資源管理的探討,原本視為公共財的觀光資源,必須考慮人的因素(而非訴諸市場失靈),因而必須將當地的社群納入分析中。然而,希利將觀光與共享資源理論接軌,卻忽略觀光活動本身的特殊性。Helen Briassoulis(2002)認為希利定義的觀光資源僅限制在視覺景觀且將之同質化,未能把觀光涉及的利益關係者與多重的財產權考量在內。Briassoulis(2002)認為觀光活動是一個跨越不同社會分類的系統,許多因素都會影響觀光資源的性質與經營成效。在這個意義上,觀光研究與共享資源理論的結合不是仰賴後者能對前者提供多少解釋力;而是透過兩者的特點來掌握社群、制度、觀光資源與觀光系統間相互界定的動態關係。

公共財方面,討論遺產保存與經濟價值的爭議議題:保存的動機關注於過渡供應、保存與維持的高經濟成本,以及缺乏足夠的收入以平衡成本。為了回應成本利益的爭議,保存論者經常正當化它們的行動,說明增加經濟價值,如工作機會、增加資產價值、促進經濟成長等,但是,在實際執行上,通常僅提供非市場價值,如美學、文化、選擇權(option values)、資產、既存價值(existence values)等(Sable and Kling, 2001)。為了修正公共財概念對非經濟面的缺乏,Michael Hutter & Ilde Rizz(1997)認為遺產是公共財,但是其價值會隨著不同的區域層級而有所不同。加入主觀認知詮釋與個人心理的層面之後,遺產的整體經濟價值不僅是使用價值,如訪客數與門票收入;更包括選擇權價值,依賴於不確定的本質與個人的態度;以及遺贈價值(bequest values),表現在個體為下一代能享受遺產所願意償付(willingness to pay);與既存價值,反映出個體雖未期待能夠親自到達卻願意償付(Peacock, 1998; Hutter & Rizzo, 1997)。為了加入更多文化經濟層面的探討,Karin Sable & Robert Kling(2001)提出雙重公共財(double public good)模式,從私人市場價值到社會非市場價值,特別是遺產成為社會認同的媒介、變遷的動力、文化持續性的證據等,呈現完整價值光譜。

在遺產觀光方面,遺產使用、經驗與產品的消費、觀光產業以及觀光客之間





的相互作用，構成遺產觀光。遺產管理與觀光產業產生之間，產生互補與衝突的複雜關係(McKercher and du Cros, 2002, p.6)。Alexandra Arellano(2004, p.67-68)在秘魯的馬丘比丘的研究，觀光化與遺產化使得遺產成為文化產品(Laenen, 1989)，提高遺產的可消費性，也加速和加遽了商業的競爭性(Hewison, 1989)，遺產除了成為多方共同獲取與競爭的符號選擇外，政治權力和商業利益也開始投入製造遺產膺品(Uzzell, 1989)。David Inglis & Mary Holmes(2003)以蘇格蘭的愛丁堡為例，在觀光脈絡下，大眾客製化所呈現的全球化商品，使得當地遺產的意義受到一定程度的扭曲與誤解。Myriam Jansen-Verbeke(2009, p.934)也發現，地方政府鼓勵企業發展該地區的觀光潛力，在觀光資源評估過程中，官方與企業都期盼能夠與當地利益相關者，透過協商達成一致的意見與共識，但是實際操作上，卻很難達成。因此，在標準化的同質性、文化商品化與當地的自主性降低的前提下，Robert Hewison(1989)以及Bob McKercher & Hilary du Cross(2002)提出警告，遺產的危險正好來自於遺產產業，衝突是在內於文化遺產觀光。

遺產經濟所延伸的範疇很廣，如何在兩學科的問題意識與理論修正歷程中，產生更多論證，是雙方必須加強的學術工作。從現有的研究可以看出，經濟人類學與文化經濟學已透過當地觀念及個人主觀層面進行探討，如果加強歷史脈絡與跨地點遺產意義比較的話，或許可以呈現更為豐富的研究面貌。

## 陸、結論

隨著多元化與複雜化的全球化歷程，原有分析策略與學科分界面臨相當多的挑戰。人類學中的經濟人類學以及經濟學中的文化經濟學，在具跨學科的次學科背景中，透過更多元與更深度的反思母學科的預設及其限制，邁向更為策略性的學科整合方向。此外，經濟人類學與文化經濟學，不僅是理論修正與跨學科採用的方向相似，在理論上與方法上也有逐漸趨同的現象，對於經濟與文化關係的實質分析能力提升，不失為令人興奮的發展，兩個次學科之間的分裂與混交儼然成形。

本文透過提出遺產經濟的議題，試圖在兩學科的議題交會處，承接兩學科各自的問題意識，並期待能形成跨學科研究與理論對話。不過這樣的對話是否能從次學科的研究累積，影響回母學科的理論，是後續值得繼續觀察的重點。



## 參考文獻

- 黃應貴(1974)：Tiv與Siane經濟：經濟人類學的實質論派與形式論派之比較。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35, 145-162。
- 黃應貴(1993)：作物、經濟與社會：柬埔寨布農人的例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75, 133-169。
- 黃應貴(2008)：反景入深林：人類學的觀照、理論與實踐。台北市：三民書局。
- Acheson, J. M. (1985).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ine Lobster Market. S. Plattner (Ed.), *Markets and Marketing* (pp. 105-130). Lanham: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 Akin, D. (1999). Cash and Shell Money in Kwaio, Solomon Islands. Akin D. & J. Robbins (Eds.), *Money and Modernity* (pp. 103-130).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Arellano, A. (2004). Spirits, Bodies and Incas: Performing Machu Picchu. J. Urry & M. Sheller (Eds.), *Tourism Mobilities: Places in Play, Places to Play* (pp. 67-77). London, Routledge.
- Appadurai, A. (1986). Introduction: 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 A.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pp. 3-6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rlett, P. F. (1980). Adaptive Strategies in Peasan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9, 545-573.
- Becker, G. S. (1996). *Accounting for Taste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ecker, G. S. & Casey B. M. (1997). The Endogenous Determination of Time Prefer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 3, 729-758.
- Bird-David, N. (1992). Beyond 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 A Culturalist Reformulation. *Current Anthropology*, 33, 1, 25-47.
- Bloch, M. (1989). The Symbolism of Money in Imerina. J. Parry and M. Bloch, (Eds.), *Money and the Morality of Exchange* (pp. 165-19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hannan, P. (1955). Some Principles of Exchange and Investment among the Tiv.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7, 60-70.
-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London: Routledge Press.
- Bourdieu, P.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Briassoulis, H. (2002). Sustainable Tourism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Common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9, 4, 1065-1085.
- Brison, K. (1999). Money and the Morality of Exchange among the Kwanga, East Sepik Province, Papua New Guinea. D. Akin & J. Robbins (Eds.), *Money and Modernity* (pp. 151-163).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 Camerer, C. F. (2002). *Behavioral Game Theory: Experiments on Strategic Interac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arsten, J. (1989). Cooking Money: Gender and the Symbolic Transformation of Means of Exchange in a Malay Fishing Community. J. Parry & M. Bloch (Eds.), *Money and the Morality of Exchange* (pp. 17-14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ves, R. E. (2000). *Creative Industries: Contracts Between Art and Commerce*.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lammer, J. (1978). *The New Economic Anthropolog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Clammer, J. (1987). *Beyond the New Economic Anthropolog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Cook, S. (1966). The Obsolete 'anti-market' Mentality: A Critique of the Substantive Approach to Economic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8,323-345.
- Cook, S. (1973). Economic Anthropology: Problems in Theory, Method, and Analysis. J. Honlgnlan (Ed.), *Handbook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pp. 795-860). Chicago: Rand McNally.
- Copeland, T. (2006). Constructing Pasts: Interpreting the Historic Environment. A. Hems & M. R. Blockley (Eds.),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pp. 83-9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Dalton, G. (1969). Theoretical Issues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10, 1,63-102.
- Douglas, M. (1962). Lele Economy Compared with the Bushong: A Study of Economic Backwardness. P. Bohannan & G. Dalton (Eds.), *Markets in Africa* (pp. 211-233). Evan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Douglas, M. & Baron I. (1979). *The World of Goods*. New York: Basic Books.
- Douglas, M. & Aaron W. (1982). *An Essay on the Selection of Techn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ng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ehr, E. & Klaus M. S. (1999). A Theory of Fairnes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817-868.
- Fehr, E. & Simon G. (2000). Cooperation and Punishment in Public Goods Experimen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 4,980-994.
- Fukuyama, F. (1995).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 Fukuyama, F. (2001). Social Capital, Civil Society and Development. *Third World Quarterly*, 22(1),7-20.
- Geertz, C. (1979).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 Geertz, C. (1984).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 Gladwin, C. H. (1979). Production Functions and Decision Models: Complementary Models. *American Ethnologist*, 6, 653-674.
- Godelier, M. (1977). *Perspectives in Marxist Anthrop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ody, J. (1967).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LoWili*.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raburn, N. H. H. (2001). Learning to Consume: What is Heritage and When is it Tradition? N. AISayyad (Ed.), *Consuming Tradition, Manufacturing Heritage* (pp. 68-89). London: Routledge.
- Granovetter, M.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3, 481-510.
- Gregory, C. A. (1982). *Gifts and Commoditie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Gudeman, S. (1978). Anthropological Economics: The Question of Distribution.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7,347-377.
- Harrison, L. E. (1985). *Underdevelopment Is a State of Mind: The Latin American Case*. New York: Madison Book.
- Healy, R. G. (1994). The Common Pool Problem in Tourism Landscape.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1, 3, 596-



611.

- Henrich, J., Boyd, R., Bowles, S., Camerer, C., Fehr, E., Gintis, H., & Richard M. (2001). In Search of Homo Economicus: Behavioral Experiments in 15 Small-Scale Socie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73-78.
- Henrich, J., Boyd, R., Bowles, S., Camerer, C., Fehr, E., Gintis, H., McElreath, R., Alvard, M., Barr, A., Ensminger, J., Hill, K., Gil-White, F., Gurven, M., Marlowe, F., Patton, J., Smith, N., & David Tracer (2005). “Economic Man”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Behavioral Experiments in 15 Small-scale. *Societie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8,795-855.
- Herrmann-Pillath, C. (2000). *Culture and Observation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Systems*. Discussion Paper. University Witten-Herdecke.
- Hewison, R. (1989). Heritage: An Interpretation. D. L. Uzzellv (Eds.),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Vol I The National and Built Environment* (pp. 15-22). New York: Belhaven Press.
- Hollingsworth, J. R. & Robert B. (1997).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The Embeddedness of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wkins, J. (2001). *The Creative Economy: How People Make Money from Ideas*. London: Penguin.
- Hutter, M. & Ilde R. (1997). *Economic Perspectives on Cultural Heritage*.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Ltd.
- Inglehart, R. (2004). *Human Beliefs and Values: a Cross-Cultural Sourcebook Based on the 1999-2002 Values Surveys*.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Inglis, D. & Mary H. (2003). Highland and Other Haunts: Ghosts in Scottish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30, 1, 50-63.
- Jansen-Verbeke, M. J. (2009). Tourismification of Cultural Landscapes: A Discussion Note. *Resources Science*, 31, 6, 934-941.
- Kagel, J. H. & Alvin E. R. (1995). *The Handbook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Keat, R. (1999). Market Boundaries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 in L. Ray and A. Sayer (Eds.), *Culture and Economy after the Cultural Turn* (pp. 92-111). London: Sage Press.
- Kingsolver, A. (1992). Tobacco, Textiles, and Toyota: Working f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Rural Kentucky. F. Rothslein, and M. Blim (Eds.), *Anthropology and the Global Factory* (pp. 191-205). New York: Bergin and Garvey.
- Klamer, A. (1996). Economic Aspects of Cultural Exchange. A. van Hemel, H. Mommaas, & C. Smithuijsen (Eds.), *Trading Culture, GATT, European Cultural Policies and the Transatlantic Market* (pp. 39-48). Amsterdam: Boekmanstichting.
- Klamer, A. (2003). A Pragmatic View on Values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10, 2, 191-212.
- Kopytoff, I. (1986).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 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 A.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pp. 64-9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enen, M. (1989). Looking for the Future Through the Past. D. L. Uzzell (Eds.),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Vol I The Natural and Built Environment* (pp. 50-63). New York: Belhaven Press.
- Landes, D. S. (1998).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Why Some are so Rich and Some so Poor*. London: Little Brown Press.



- Lewis, J. & Toby M. (2003). *Critical Cultural Policy Studies: A Reader*. Malden: Blackwell Press.
- List, J. A. (2003). Does Market Experience Eliminate Market Anomal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1, 41-71.
- Loulanski, T. (2006). Revising the Concept for Cultural Heritage: The Argument for a Functional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roperty*, 13, 207-233.
- Malinowski B. (1922). *Argonauts of Western Pacific: an Account of Native Enterprise and Adventure in the Archipelagoes of Melanesian New Guinea*. London: G. Routledge & Sons Press.
- Margolis, H. (1982). *Selfishness, Altruism, and Ration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arriott, M. (1955). *Village India: Studies in the Little Communi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asser, I., Ove S., & Michael W. (1994). What New Heritage for Which New Europe? G. J. Ashworth & P. J. Larkham (Eds.), *Building A New Heritage: Tourism,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the New Europe* (pp. 31-46). London: Routledge.
- Mauss, M. (1954). *The Gift: Forms and Functions of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London: Cohen and West Ltd.
- McKercher, B. & Hilary du C. (2002). *Cultural Tourism: The Partner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Cultural Heritage Management*. New York: The Haworth Hospitality Press.
- Messinis, G. (1999). *Rational Habit Modification in Consumption: the Role of Durables and Credit*.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Research Paper No. 681. 47.
- Mintz, S. (1985). *Sweetness and Power: The Place of Sugar in Modern History*.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Inc.
- Mishan, E. (1969). *The Costs of Economic Growth*. London: Penguin.
- North, D. C.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Press.
- North, D. C. (2000).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J. A. Frieden and D. A. Lake (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 and Wealth* (pp. 47-59). New York: Routledge.
- Owen-Vandersluis, S. (2003). *Ethics and Cultural Policy in a Global Econom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Peacock, Sir A. (1998). Does The Past Have a Futur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eritage*. London: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
- Plattner, S. (1989). Economic Behavior in Markets. S. Plattner (Ed.), *Markets and Marketing* (pp. 209-221). Lanham: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 Polanyi, K. (1958). The Economy as Instituted Process. G. Dalton (Ed.), *Primitive, Archaic, and Modern Economies: Essays of Karl Polanyi* (pp. 139-174). Boston: Beacon Press.
- Power, D. (2002). Cultural Industry in Sweden: an Assessment of their Place in the Swedish Economy. *Economic Geography*, 78, 2, 103-127.
- Prattis, J. L. (1982). Synthesis, or a New Problematic in Economic Anthropology. *Theory and Society*, 11, 205-228.
- Prattis, S. (1989). *Economic Anthropolog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Redfield, R. (1956).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to Civiliz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izzo, I. & Ruth T. (2002). *The Economics of Heritage: A Study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ulture in Sicily*.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 Sable, K. A. & Robert W. K. (2001). The Double Public Good: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Shared Experience Values Associated with Heritage Conservation.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25, 77-89.
- Sahlins, M. (1976). *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ahlins, M. (1981). *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 Structure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Sandwich Islands*. Michiga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Sahlins, M. (1994). Cosmologies of Capitalism: The Trans-Pacific Sector of the World System. N.B. Dirks, G. Eley and S.B. Ortner (Eds.), *A Reader in Contemporary Social Theory* (pp. 412-455).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amuelson, P. A. (1947).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ayer, A. (1997). The Dialectics of Culture and Economy. R. Lee and J. Wills (Eds.), *Geographies of Economies* (pp. 16-26). London: Arnold.
- Schneider, H. K. (1974). *Economic Man: The Anthropology of Economics*. New York: Free Press.
- Schneider, J. & P. Schneider (1976). *Culture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Western Sicil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Inc.
- Scott, A. J. (1997).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Ci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1, 2, 323-339.
- Sen, A. (1977). Rational Fools: A Critique of the behavioural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theory.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6(4),317-344.
- Simon, H. A. (1982). *Model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Cambridge: MIT Press.
- Straight, B. (2002). From Samburu Heirloom to New Age Artifact: The Cross-Cultural Consumption of Mporo Marriage Bead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4, 1, 7-12.
- Taussig, M. T. (1980). *The Devil and Commodity Fetishism in South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Throsby, D. C. (2003). Determining the Value of Cultural Goods: How Much (or How Little) Does Contingent Valuation Tell Us?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ics*, 27(3-4)275.
- Toren, C. (1989). Drinking Cash: The Purification of Money through Ceremonial Exchange in Fiji. J. Parry and M. Bloch (Eds.), *Money and the Morality of Exchange*, (pp. 142-16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Uzzell, D. (1989).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Volume 1: The Natural and Built Environment*. London: Belhaven Press.
- Wallerstein, I. (1991).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Wallerstein, I. (1995). What Are We Bounding, and Whom, When We Bound Social Research. *Social Research*, 62, 839-856.
- Watson, J. L. (1997). *Golden Arches East: McDonald's in East As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chard W. (1996). *Economics and Cultures: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thropology*.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 Zukin, S. (1995). *The Cultures of Cities*. Oxford: Blackwell Press.

